

大批判材料

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

第11期

(总第24期)

中共苏州市委大批判组编

1977年7月12日

卖身投靠想求荣 梦幻破灭枉费心

——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江苏的一个代理人

李伦楚

杨立

恩格斯在揭露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对这些人说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确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可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本性未除，他们所追求的幸福从表面上来看虽然不是赤裸裸的金钱，但对猎取“厚禄”、“高官”的欲念倒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他们不惜有“船票”就买，见“贼船”就上，认贼作父，卖身求荣。“四人帮”在江苏的一个代理人就是这路货色。然而，此人一贯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左派”，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善良的人们，本来是不知道他在暗地里干些什么名堂。在“四害”横行时，他估计篡党夺权“大业”将成，破门而出作了一番表演，终于被人们抓住了。经过七批八批，他无可奈何地承认：“我又圆又滑，灵魂肮脏。”

利令智昏 卖身投靠

“四人帮”在江苏的这个代理人，一向以说大话，唱高调，而不大干实际工作闻名。人们为他取了一个绰号，名曰：“不倒翁”。毛主席对这种摇摆者，早就指出：“墙上一莠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此人多年来的表演证明，他摇向马列主义“不是本心”，摇向修正主义“才是本心”。修正主义的“官、禄”，他礼拜最勤，利令智昏，趋炎附势，见奶认娘，卖身求荣。政治上投靠“四人帮”就成为他必然的归宿了。

当年，林彪在“四人帮”支持下，阴谋篡党夺权，猖狂不可一世。此人追随林彪，吹捧林彪，卖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残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此人赤膊上阵，充当打手。他跟着林彪反党集团的调子恶毒诽谤陈毅同志，胡说陈毅“不是个军事家，是隐藏在毛主席、党中央身边的危险人物”，等等，妄图抹煞陈毅同志的光荣历史，磨灭陈毅同志在革命人民中的深远影响。他还用恶言秽语谩骂中央一批老一辈的革命家。此人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有功”，因而深受林彪反党集团赏识，当时窃取军委办事组领导大权的林彪一个死党，曾指名要调他到军委重要部门工作。

林彪尸焚沙漠以后，此人顿时“摇身”一变，隐瞒了他同林彪反党集团的牵连，把自己打扮成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英雄”，大捞政治资本。在此同时，他改换门庭，一头扎进“四人帮”的怀抱。一九七一年四月，他去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当教育会议没有结束，他又窜去另一个会议，乘机挤去餐厅，与江青同桌进餐，拉上关系。会议期间，他大谈《沙家浜》文物，说得天花乱坠。从此找上门子，托人把“春来”茶壶“献”给了江青。这把茶壶原先是常熟县横泾公社保管的，因为壶上刻有“春来”二字。此人知道了，特地以“参观”为名，到了这个公社，别事不干，有心要看茶壶，掏出手帕包起来，顺手就捞走了。一把茶壶虽小，此人自有妙用。这次作为“进见之礼”，正是送到骨节眼上。事后，他又抓住良机登门朝拜，攀上了江青的“门庭”。什么“江青住的地方很朴素”啦，什么“江青是我们学习的模范”啦，等等，就不断从此人的嘴里冒出来。此人同政治流氓王洪文的勾搭又是一番情景。就在一九七一年底，他带领一个宣传队到上海演出。他同王洪文打得火热，又是同桌吃饭，又是同台合唱，又是勾肩搭背，亲密无间。王洪文把此人选中为收罗对象，此人对王洪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两人相见恨晚，常常谈到深夜。此后，王洪文窜来南京，他专门伺候问安，陪同吃喝玩乐。此人与“四人帮”结识数年，据不完全统计，直接接触达二十多次。这种亲密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之间，一方是有情，一方是有意，心心相印，早就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了。

要说此人进一步卖身投靠“四人帮”，那是在去年年初。当时，周总理逝世，毛主席深谋远虑，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给“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以致命打击。“四人帮”对毛主席的英明安排，仇视至极，发动了一次次猖狂进攻，妄图“新桃换旧符”。中国大地上空乌云压城，山雨欲来。二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议期间，“四人帮”不分白天黑夜，轮番出没于宾馆，一面给一大批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扣帽子，打棍子，一面搞反革命串连，网罗党羽。我省的这个人在那里参加会议，他赶忙找“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靠拢挂钩。本来，“四人帮”余党打算在这次会上进一步摸摸此人的“底”，伺机拉拢。没想到他“送货上门”。并且一见面就“态度明朗”，破口大骂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给江苏省委戴上“搞复辟”的大帽子，借此表明他对“四人帮”归顺之心。“四人帮”的余党喜出望外，立即感到可以和此人“谈知心话”了，便拍着此人肩膀说：“他们要老家伙，可你这个老家伙他们不要！”此人听了立刻激昂地说：“他们不要我，好得很！”这句话表达了一个潜台词：“他们不要，因为我是你们要的。”双方眉来眼去，心照不宣。“四人帮”余党马上给他交了“路线底”：“江苏省委陷进去了，问题不简单！”就在这一唱一和之中，完成了交易。果然，打招呼会上，“四人帮”对他态度大不相同。“四人帮”对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是凶神恶煞，动辄训斥；而对此人则笑脸相迎，慰勉有加。善于察言观色的这个人，心领神会，受宠若惊。他得意地说：“他们态度不一样，对我好，我们要好好干哪！”

此人常常是言而无信，可对“四人帮”却极有“信义”。他一回到南京，便使出浑身解数，大干特干起来。华国锋同志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是毛主席批准的。此人公然对抗这个讲话，完全按照“四人帮”黑旨意另搞一套。中央指出：“注意不要层层揪”；此人到处煽动层层揪，执行“四人帮”揪住第一把手不放的反革命策略。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紧锣密鼓，此人得志更猖狂。在同年四月十六日中央的一次接见会上，他撕又假面，搞突然袭击，帮同“四人帮”欺压省委和南京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张春桥污蔑江苏和南京部队“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此人说：“南京是流言蜚语，谣言四起，得不到批判。”江青恶狠狠骂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你冲天了”；此人说，南京事件“主要是领导态度不明确，

不斗不制止，任其蔓延”。张春桥气呼呼地说：“南京放电影，我出来就有人骂”；此人不阴不阳地说：“这不是偶然的”。张春桥称他“看法对头”，江青夸他“旗帜鲜明”。此人回到南京，对人说：“对他们批得凶哪！”“我受江青的表扬鼓励，责任重大，不能辜负江青的期望哪！”

用笔杀人 大告阴状

做卖身求荣勾当的人，身为下贱就必然急“功”牟“利”。这个“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也没有超脱这个常规。他急不可待地要取宠“四人帮”，搞乱江苏，搞垮省委，自己篡权登台。告阴状，送情报，就成为他的搞鬼要术。

此人告阴状方法多样，有书面的、口头的，还有特派人员；递送阴状的渠道也不少，有“四人帮”直接控制的新闻单位，有“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中转站”。但是，只要看一看此人自己向“四人帮”告状，怂恿心腹告状的事实，看一看他通过上面新闻单位所谓记者告状的事实，就可见人的灵魂肮脏、手段卑劣了。

他同“四人帮”远隔千里，难得有机会向主子当面奉献忠诚。因此他每上一趟北京，事先就拚命搜集告阴状的材料。去年初，周总理逝世，南京群众到梅园新村、雨花台举行悼念活动，此人竟大骂群众是“自由市场泛滥”。这个黑讲话理所当然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抗议。此人一听火冒三丈。四月，他竟把群众意见的电话记录稿，带去北京，当面向“四人帮”告状，哭丧着脸说：“我在南京讲了几条意见，有人说我反总理，要我反。”既是告发，又是表功。就是说，在对待周总理的问题上，我同你们是一个样，南京有人反对我不就反对你们吗？！狗头军师张春桥一听马上给他撑腰打气，“好嘛！他们要反你，让他们反嘛！”叛徒江青随即气势汹汹地责问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这个事你为什么还不汇报？！”此人眼见告状颇有灵效，一连串告了许多人的状。当他看见王洪文经常带秘书出没于宾馆，又马上指使自己的心腹出面代替他告状：“快去同洪文的秘书啦呱、啦呱！”从此，他又开辟了一条告黑状的渠道。他的心腹同王洪文秘书、“四人帮”上海余党秘书之间，电话往返频繁。那一头探听内情：“你省情况如何？”这一头告状求援：“我省运动深入不下，阻力来自领导，欢迎你们来南京帮助。”

“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一些新闻单位，更是此人告黑状的渠道。他勾结上面新闻单位派驻江苏的那个老头子、以及来往于京宁之间的几个所谓记者，干下了一笔笔黑买卖，输送了一大堆黑材料。他们之间的关系超乎寻常。你看他们，今天在“西楼”晤谈，明天在“公馆”相叙。一方面是建议“把情况迅速、及时地向上（四人帮）反映”；一方面回答“我们已向上（四人帮）汇报，他们很重视。”

且看他们“迅速反映”些什么？“四人帮”这伙“很重视”的又是些什么？

他们急于要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置于死地。什么“幕后策划者”、什么“正在走的走资派”等等一顶一顶的帽子向人们头上压下。又是什么“他们对上面（四人帮）指示不想贯彻，不想把运动搞下去，清查只搞了浮在面上的，不想深下去；关键在领导，主要是某、某啊！”什么“态度暧昧”啦，“抓得不力”啦等等，连篇累牍。当文痞姚文元来电要查实一封控告信时，他们认为良机莫失，赶快提供情况：什么“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电话给办公室主任，要组织学习周总理追悼会上的悼词，要注意悼词提法，同元旦社论不同”，云云。什么

“送花圈、搞悼念，是省委负责同志同意的”，云云。他们还乘机搜集捕风捉影的东西，加油添醋，凭空捏造，搞了黑材料。

他们极为狡猾，抓住《工农兵评论》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死不放手，把这当作搞垮省委的重磅炸弹和突破口。此人杀气腾腾地反复扣住这个观点：“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篇文章？为什么那个时候搞？不是配合在一起吗？”姚文元来电索取文章原文，张春桥叫嚷：“没有发表也要批”。一时闹腾得人仰马翻。悼念周总理何罪？写悼念文章何罪？但是，他们要借机杀人。他们四月写“调查情况”，五月再写“调查情况”，六月又写“调查情况”。无穷的调查，写不完的“情况”。直到九月，他们还喋喋不休地讲：“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表示极为遗憾。其实问题是很清楚的，他们遗憾的，只是屠刀还“没有”砍掉他们要砍掉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

去年九月八日，此人通过他在新闻单位那个老头子向“四人帮”提供的材料中，厚着脸皮毛遂自荐，吹嘘自己说“我决心把运动搞到底的”，“我是省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我真想起点作用”；“我是满腔热诚的”，“好心好意的”，但自己“光有个秘书，别的什么也没有”，结果“想起点作用也很困难”。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话是给“四人帮”表忠心、要高官的。十月四日，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紧锣密鼓声中，这份材料递到王张江姚手里。那个时候，此人内心好不乐滋滋，似乎好运道顷刻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但是，高兴得太早了。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两天以后，“四害”被除，普天同庆。对他来说，却是黄粱未熟，美梦已破，要了他的“老命”。

领受黑旨 亦步亦趋

此人卖身投靠“四人帮”干尽坏事，可是，他竟然胡说什么“自己去年是按照中央指示和报纸精神办的”。既然如此，就把此人昔日拿着“四人帮”的鸡毛当令箭，亦步亦趋的丑恶行径揭露出来，看看他究竟是“按照”什么干的！

所谓“苏州问题”，去年一度甚嚣尘上。苏州市确是不一般。这里，地理上是江南重镇，政治上有“四人帮”在那儿的代理人×师傅“坐山为王”。因此，就被“四人帮”视为“上海外围”，根据地的“卫星城”。王张江姚直接插手所谓“苏州问题”，把它作为在全国篡党夺权的重要一着棋。他们制造一系列谎言，发出了一系列黑指示。政治流氓王洪文污蔑省委在苏州“搞复辟”，威胁省委“必须把苏州问题处理好。处理不好，要影响无锡、常州、镇江，整个苏南就会乱起来。”什么“苏州问题”？！无非是他们一伙实施“以苏治苏”、“以苏乱苏”的反革命策略需要炮制出来的。但是，此人心领神会。主子号令一下，奴才马上行事。他抓住苏州市问题，大做文章。×师傅纠集一批人杀向南京，事先向他电话汇报，他就登门与×师傅密谋机宜；×师傅的人在街头制造事端，冲击公安机关，他就在省委常委会叫嚷“×师傅是搞右倾翻案的受害者，省委犯了路线错误”。好端端的南京城，给他们闹得乌烟瘴气，民无宁日。他们还嫌不够，此人还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串通一起，经过密谋策划，设置了一个圈套，名之曰：“吃团圆饭”。就是让江苏省委负责同志到上海去，同在上海“养病”的“四人帮”在苏州市的代理人“谈判”，谈好了“吃团圆饭”。他们早就谋划在吃“团圆饭”时，胁迫省委负责同志在“苏州问题”上让步，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届时，“四人帮”的余党就倾巢而出，摆成剑拔弩张的局面。这件事，被省委负责同志所识破，顶回了他们的蛮横要求。这个阴谋是很显然的，他们妄图在“苏州问题”上打开缺口，

推而广之，就要逼省委承认一九七五年在全省范围搞了“右倾翻案”，“犯了路线错误”。这样，就可以给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戴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一巴掌打下台。所有这些，不明明白白都是按照“四人帮”早就下的黑旨意办事的吗！

“四人帮”处心积虑要把省委负责同志打成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在去年四月十六日北京的一次接见会上，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公然违背华国锋同志规定“回去传达四句话”的指示，贩卖他的私货说：“回去对对笔记，领会精神。”政治流氓王洪文又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暗地里给他们的人交底，说南京的幕后策划人就是省市委四个主要负责人。此人对“四人帮”的黑指示铭记在心。回到南京后，公开叫嚷什么“规定传达的要贯彻，没有传达的也要贯彻”。所谓没有传达的，就是“四人帮”的黑指示。华国锋同志不要他传达贯彻，他偏要想出坏主意，坚持贩卖他主子的黑货。果然，此人一面采取个别接触、秘密交谈等方法，把“四人帮”攻击省委的黑话，通给省委内他的同伙和社会上各帮派山头；一面提出了“摆正龙头”“抓大鱼”的反动口号，气壮如牛地叫喊“要追穷寇”、“要追霸王”。他说的“龙头”、“大鱼”是谁呢？他的一个心腹反反复复煽动别人说的：“要发动全省人民把眼睛紧紧盯住省委主要领导人。”就为他的黑话作了最好的注解。很清楚，此人“要摆正龙头”“抓大鱼”，完全是“四人帮”要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打成“幕后策划人”的具体实施。事情果真是如此。在此人提出了反动口号之后，江苏南京地区掀起了一阵阵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打成“幕后策划人”的反革命浪潮。

十分清楚，此人经常用来整人的中央指示，完全是“四人帮”帮中央的黑旨意。那么，此人所谈的“报纸精神”又是那一家的精神呢？

此人对“四人帮”直接操纵控制的报纸，顶礼膜拜，十分重视，“报纸精神”成了他领受主子的黑旨意的一条渠道。其实，除了这些“报纸”以外，另外还有他更重要的“报纸”。去年，“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一种内部刊物，大登特登“梁效”等等炮制的反动的新闻消息，毒汁四溅，成为鼓吹“层层揪”和“揪一层”的一把把破号。此人却象基督教徒一样奉为圣经，常常把这种刊物放在身边，做为讲话的依据，行动的规范。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作了灭亡前的猖狂一跳。当时，“四人帮”操纵的内部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动的新闻消息，狂吠：“谁背叛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谁就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叫嚣要“豁出性命”来干。真是刀光剑影，一片杀气。此人看到这个“报纸精神”，如获至宝。他在毒汁四溅的新闻消息下面又是画杠杠，又是打圈圈，到处指给别人看，事事按照这个精神干。他对一些帮派头目说，“按既定方针办，这是精神啊！当前，我们就是要把眼睛紧紧盯住党内走资派，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坚决同走资派斗到底！”请看，这个奴才在其主子灭亡前夕，还在穷凶极恶地推销贩卖他主子的黑指示，妄图与党和人民再作一番最后的较量。

此人还有什么办法狡赖呢？大量事实证明，此人领受“四人帮”黑旨意，亦步亦趋。他就是“四人帮”派在江苏的代理人。

项庄舞剑 意在篡权

此人紧跟“四人帮”，把省委负责同志视作仇敌，把江苏革命的干部和群众视作仇敌，搞了许多肮脏事、鬼名堂。这究竟为了什么？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声称：“这没有别的动机，

就是要把路线搞端正”，“我决不是要当第一书记”。说得倒也官冕堂皇。这里提醒同志注意。听话要听音，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没有偷，偷银子的偏偏就是他自己。

谁都知道，此人一向官瘾极重，却又志大才疏。长期以来，他对自己担任的职务和他分管的工作，既管不好，又不满足。胃口大得很。同志们向他汇报工作，他阴阳怪气地说：“你们不要副主任、副主任地叫。副主任有什么用！副主任是送往迎来的，跑跑飞机场，跑跑饭店。”他还经常发老骚：“我签的字不算数”，“我讲话没有用”。这些不三不四的话，正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他要做官、要权的阴暗心理。他去年向“四人帮”告黑状中，曾向那个新闻单位驻江苏的老头子说了无数的话。有一次，那人代他归纳了一下，伸出两个指头：“你的话很明确，两点：一是路线，一是班子，对嘛！”真是，深知此人之心，深悟此人之意，言简意赅，高度概括。什么路线，什么班子，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要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搞下台，让他登堂入室。

图穷匕首现。去年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推行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计划，此人同另一个“四人帮”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紧跟其主子，也加快了搞垮省委的步伐，积极准备篡权上台。当时，“四人帮”派来江苏的几个所谓记者已经找人商谈“解决江苏问题的方案”了。什么方案？用另一个人的话说，这个方案“可以落实到人头”，改组省委班子。此时此刻，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勃勃野心。在他看来，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不能再领导下去了，该让他发挥作用了。他赤裸裸地叫嚣：“要组织一个高潮”，“解决省委的路线问题”，“解决革谁的命，依靠谁来革命的问题”。好家伙，此人要做的两件大事摊牌了，就是：一，给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一个路线结论，赶下台，这叫解决“革谁的命”问题；二，给自己准备一个班子，此人要升帐挂帅夺权了，这叫“解决依靠谁来革命”问题。在这个主题下，经过帮派头目、所谓记者、亲信干将一伙的“大胆设想”，策划密谋出一套改组省委的黑方案：第一步，吸收工农中央委员参加省委常委的领导活动；第二步，由中央（四人帮）点名批判；第三步，对省委进行调整充实，主要人物调离江苏。

什么“吸收工农中央委员参加省委常委的领导活动”？这是“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蓄谋已久的。长期以来，此人同省里另两个追随“四人帮”的人，紧紧抱成一团，结成“党中之党”，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常委唱对台戏。但他们闹来闹去，仍然成不了气候。此人苦恼地说：“我们在常委会里很孤立，斗不过他们”。于是，他就提出，要把那些所谓敢“反潮流”的人提上来，参加省委领导班子，“分工把部门的关”。他所谓“反潮流”的人，即另一个“四人帮”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还有各路帮派头目。这是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的战术，把战场搬到省委内部。此人称之为“改变力量对比”。这确是真话。他要改变的是反革命和革命的力量对比。要让反革命力量压倒革命力量，把省委常委闹得昏天黑地，最后夺取省委常委和各部门的领导大权。

什么“中央点名批判”？就是让“四人帮”出面，给坚持正确路线的省委负责同志罗织罪名，戴上足以致命的大帽子。这一着，就是借他们主子的淫威和大棒杀人。此人抓住“转弯子”和“清查”大做文章，千方百计把全省搞乱，把省委搞瘫痪，正是要为“四人帮”出面“批判”江苏省制造口实。

什么“对省委进行调整充实，主要人物调离江苏”？就是来个大清洗，大换班。不跟“四人帮”跑的，统统来个：“滚”！“闹”而“优”的，各得其官。特别重要的是省委“主要人物”必须“调出江苏”。为什么？因为此人特别需要那个第一书记的“交椅”！

改组省委的黑方案三步曲，是道地的反革命狂想曲。只是想得太狂了些。正当他们妄想动手实施这个黑方案，迎接他们的什么“重大事件”，庆祝他们“盛大节日”的时候，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一声春雷，对此人来说，忽喇喇似大厦倾，一场欢喜忽悲辛，上台美梦顿时化泡影。留下的是一份失败的记录，一件篡党夺权的罪证。

一个反党恶棍

苏 伦

邵学琪

“四人帮”及其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在我省搞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有一名翁森鹤式的黑干将。此人过去虽然名为苏州市总工会负责人，却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人帮”搞乱江苏的前台打手。当年，“四害”横行，乌云乱翻，他拚死卖命地贯彻“四人帮”搞乱江苏、搞垮省市党委的反革命阴谋，在沪宁线上，苏州市中，南京城里，制造反革命舆论，冲击省市机关，寻衅闹事，横行霸道，妄图篡夺党权、政权，为“四人帮”复辟资本主义的劲头，大有推倒钟山，断流长江之势，真是猖狂不可一世。

任何一次革命都有这种现象，就是社会上的各种沉滓泛起，一些恶棍、冒险家和其它危害分子乘机泛出来表现一番，有的甚至钻进了我们的党内。但是，沉滓毕竟是沉滓。春雷霹雳一声响，华主席粉碎了“四人帮”，这个得志猖狂的反党恶棍，终于又沉了下去，陷于灭顶之灾。这样的一泛一沉，他的本相更加分明，使广大革命的人们弄清了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混迹革命的资产阶级右派

此人一贯自封为什么响当当的“大左派”。据说他成份颇好，自幼是“孤儿出身”云云。

什么自幼“孤儿出身”？据查证，他的父亲干过结伙抢劫的罪恶勾当。解放初期，结帮盗窃我公粮船只，当场被我护粮的解放军鸣枪击中，受伤逃窜外地，后被迫向我人民政府自首，拘留惩处。此人二十多岁以后其父方才呜呼哀哉，何来自幼“孤儿”之说，完全是伪造、撒谎。

党对他仁至义尽的。让他进了技工学校，分配在一个大型工厂工作。可是，他以怨报德。一九五七年，此人乘我党整风，向党猖狂进攻。那时，他鼓吹“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胡说“旧社会的工人情况并不象讲的那样惨，旧社会工人还有选择工作的自由，这儿不要，可到其它地方去，现在可不行了”。并且发泄他的阶级仇恨，说：“旧社会，我父亲一个人能养活几个人，现在我就不行了。”公然为吃人的旧社会大唱颂歌，放肆诬蔑新社会的工人在九地之下。更加凶恶的是，他把刀刀指向伟大的共产党，嚎叫：“有些共产党员的错误用整风来改是不行的，要杀才行。”他的言行有极大的尖锐性，就是要举起屠刀杀共产党人，推翻人民政权，梦想变天复辟。这就鲜明地告诉人们：此人本来就是一个对党对人民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的资产阶级右派。

查出了此人的老底子，为什么他疯狂地干下那么多的反党反人民的勾当，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此人的“头角”出现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当革命风暴乍起，他“给人以假象，而

将真象荫蔽着”，混进革命群众组织，随后又混进了共产党。这段历史是他经常炫耀的“老造反”的造反生涯。想当年峥嵘岁月，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挥下，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战斗。但是，正象列宁所指出的，历史上一切革命运动“都不免会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者中间”。他就是这种冒险家和骗子。他的所谓“老造反”，就是老造无产阶级的反，老造共产党的反，把矛头指向革命的老干部，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九六八年初，周总理曾对苏州市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问题，专门作了重要指示。此人竟公然攻击周总理的指示是什么“合二而一的翻版”，妄图掀起炮打周总理的逆流。去年初，周总理逝世，举国同悲。“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控制的报纸，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删掉了周总理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这一严重政治事件，激起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义愤。此人却跳出来为“四人帮”的余党辩护，用各种恶毒的秽语咒骂革命群众。当他听到传说南京一批工农兵学员要步行前往上海找“报纸”辩论时，更是跳得百丈高，狂叫：“好，让他们来，我出动民兵带枪拦阻，先鸣枪警告，如果他们再前进，就撩倒他几个。”此人的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恨不得把怀念周总理的革命干部和群众，统统斩尽杀绝。他的一番表演，深得“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的赞赏，称赞他“工作细”、“水平高”。

此人还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他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和“四人帮”的大合唱一起，别有用心地在代总理的“代”字上大做文章。华国锋同志经毛主席批准、代表党中央作了“不要层层揪代理人”的重要指示，他又恶毒地加以攻击，心怀叵测地煽动说：“不要层层揪代理人，究竟有没有代理人，是代理人还是一家人？”这句黑话实质上就是张铁生反革命语言的翻版，既攻击华主席，又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个反党恶棍被革命群众押上历史审判台时，无可奈何地说“我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其实他的旧胎反骨从来也没有脱换过。多年来混迹于革命队伍的生涯，无非是从反党反人民的老右派走向极右派。胎骨依旧，越来越坏而已。

闹而优则仕的官迷

毛主席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右派人物是“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他们的狼子野心在于篡党夺权。身在苏州的这个极右的反党恶棍梦寐以求的就是“权”、“官”两字。为了夺权抢官，他信奉“闹而优则仕”的信条，不顾党纪国法，赤膊上阵，大闹特闹，妄图闹乱苏州市委，闹乱江苏省委。

倚仗谁的势力闹？此人开口是“请示过中央”，闭口是“我们通天的”，危言耸听，借以吓人。他的“中央”就是“四人帮”，他的“天”就是王张江姚。这伙反革命黑帮就是此人闹乱江苏所倚仗的“靠山”。多年来，凭他反革命的嗅觉和善观风向的投机本领，认准“四人帮”的黑门押宝。他除了跟随“四人帮”在苏州市的代理人向王洪文、江青写黑信、告黑状以外，还自找门路建立自己的直通黑线。两年多来，他以个人名义向“四人帮”投黑信、送黑材料有十多次。又是献忠心，又是告阴状，攻击省委“否定文化大革命”，诬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是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他乞求“四人帮”赶快对江苏“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对省委的领导”。什么“必要措施”？就是要把省委负责同志打下

去；什么“加强领导”，就是让他们一伙登堂入室，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四人帮”叫嚣的“江苏乱得不够”，要由“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闹得它个天翻地覆”等等黑话，被这个反党恶棍奉为圣旨，紧密配合“四人帮”乱党、乱国的活动，上下相应，大闹特闹，闹得党无宁日，民无宁日。

且看看他是怎么闹的：

对苏州市委。他是逢会必闹，大会大闹，小会小闹；会前造舆论，雷声隆隆，会上看形势，说下雨就下雨。轰散了会议，还对市委倒打一耙，什么“打击新生力量”、“压制大辩论”等等。闹得人睡不着觉，抓不起革命，促不成生产，瘫痪了事。

对苏州地区。他竭力煽动几个跳梁小丑，抢占地区机关，绑架、围攻地委书记。

对南京地区。他的反动口号是“把火烧到南京去”。从去年二月开始，他就纠集一些帮徒，胁迫一批人员，沿沪宁线杀向南京城。屯兵于招待所内，闹事于通衢街头。省委召开重要会议，那个“四人帮”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和他们帮派的女掌柜在会内发难，他在会外“火力支援”。一霎时，南京街头黑文满天飞，黑话到处传，反动大字报一批接着一批，铺天盖地，既有污言秽语，又有谣言撒谎，一口咬定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是“右倾翻案风的吹鼓手”，“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走资派，是还乡团，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各色帽子成片飞来。他们胡搅蛮缠，闹得没完没了，把好端端的南京市弄得乌烟瘴气，日夜不宁。八月份，他伙同“四人帮”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制造了震惊全省的“水佐岗派出所事件”，借机扩大事态，煽动数百人，从苏州涌进南京城，图谋占领省委机关，绑架省委和省公安厅负责同志，为“四人帮”表态创造条件，加速实现乱省篡权的罪恶目的。

闹是为了做官，闹得优、闹得凶是为了做大官。这个反党恶棍从闹起家，窃据了苏州市总工会负责人的要位，但他仍嫌纱帽太小。他在一篇为苏州市帮派老头子写的黑文中，写下一段自鸣得意的妙文，说什么“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如果决定由同工人阶级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来领导江苏的运动，为什么我们不能同全省人民一起拍手称快呢！”这就不打自招地和盘托出了他们的狼子野心。所谓“党中央决定”等等都是假话，真意在于由他们取省委而代之，“来领导江苏的运动”。因为在他们看来，由“四人帮”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篡取省委领导大权，而这个反党恶棍坐上省委常委的高位，是“天经地义”的。其实，此人熏心的权欲早已溢于言表。他把帽子扔给别人，攻击省市委领导班子统统不行，老干部是“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派”，青年干部是“处于垂死状态的新生力量”；他把桂冠抓给自己，说自己是“有能力善战斗的造反派”。照他的分析，当大官，享厚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了。于是，他头上顶着市总工会负责人的纱帽，屁股坐着不是市委常委会的市委常委会的交椅，眼睛觊觎着省委常委的位子，一面忌妒地骂他的一个同伙：“她是爬在我肩膀上上去的，她再爬，我一定要把这个九天玄女娘娘的脚蹬头咬下来。”一面又策动亲信为自己写“劝进书”，推他爬向上位。一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贪婪恶相，暴露无遗。

这个反党恶棍已经达到利令智昏的地步了。但他逃不出辩证法的制约。平生贪做官，老嫌纱帽小，妄想闹而仕，终致锁枷扛。对他来说，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结帮压党的政治恶霸

多年以来，“四人帮”在苏州市的那个代理人，坐山为王，结成了独立于党组织以外的

帮派体系，以帮压党，以帮代党。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其中冒尖的帮痞就是这个反党恶棍。他惯用一切流氓手段同无产阶级较量，深得帮派“老头子”的赏识，在帮内坐上第三把交椅，是一伙打手的黑头目。正象他自己说的，“冲冲杀杀打天下的是我”。要论反党、乱党、压党的“帮功”，确是数得到他的。

这个反党恶棍以打砸抢闻名。一些地痞、流氓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就如蝇逐臭似地聚集在他门下；他也拚命网罗各种社会渣滓作为依靠力量，把这伙反党反人民的散兵游勇收进帮内，以壮山头。革命群众视为垃圾的“脏物”，却是他手中的“金刚”。在这些头目中，有参加汪伪特务组织的坏蛋，腐化堕落、投机钻营的败类，不务正业、制造谣言的文痞，头有反角、身长毒刺的恶少，等等，号称“八大金刚”，充当他大反党委、搞乱江苏的打手。闹起事来，鼓噪而起，蜂拥而上，文谣武压，双管齐下。今天镇压某校工农兵学员，明天冲砸市委办公大楼；一会儿在会上哄闹，一会儿在会后恫吓。这都是这帮打手的“杰作”。

这个反党恶棍深信“帮荣俱荣，帮损俱损”的常规，下劲推行“顺帮者昌，逆帮者亡”的手法，保护帮派利益。谁对他们的帮说上个“不”字，或者稍有抵制，就视作仇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特别是不能触犯帮内有权势的人物，谁犯谁遭殃。帮里“老头子”、“四人帮”在苏州市的代理人早就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林彪、陈伯达起哄发难，为林贼抢班夺权吹喇叭、抬轿子。一九七四年，有些同志贴大字报要求对这件事进行审查，一下捅了他们的马蜂窝。这个反党恶棍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立即组织帮兄弟追查围剿。又是逼写检查，又是降职下放。他镇压群众的手段是毒辣的。一次，他以蹲点为名，窜进一个工厂，手里扬着张春桥、姚文元两篇黑文说：“我是带着这个上方宝剑来的”。他随身带着逮捕证、铁手铐，任意捕人、打人，大搞白色恐怖，实行法西斯专政。一个工人被他打了五十大板重伤卧床；一个插队青年被无理关押十一个月。哪里被他们的帮势控制，哪里就暗无天日。

这个反党恶棍在“四人帮”在苏州市的代理人的指挥下，俨然把苏州市的帮派集团自居于盟主地位，广开帮门，由他招徕、接应各方结帮反党的“仁人志士”。一时间，各路山头的代表云集苏州，成了他们“门庭”的上宾。过去的“旧怨”可以一笔勾销，往日的“仇敌”可以握手言欢，什么“嫌隙”，都是“历史性误会”，只要为搞垮省委这一反革命目标“共同战斗”，就统统是亲家朋友。他对各路帮友，既是“鼓邪劲”，又是“传黑经”，结成了反革命的“神圣同盟”，相约待机围攻省委，左右南京局势。

这个反党恶棍结成帮势，以帮压党，以帮代党，凌驾各级党委之上称王称霸。他们对苏州市委常委一些成员，采取了又拉又打，拉拉打打，分化瓦解的手段，篡夺了市委大部分权力，达到以帮代党的目的。政治问题先在帮内密谋，思想问题先在帮内统一，组织问题先在帮内解决。他以“任人唯阔”为标准，一个晚上就为提拔区、局干部提出了三十个名单。他利用帮势，骄横跋扈，对党发号施令，对宣传口径、点名批判、标语口号等，随心所欲，私自决定，另搞一套，并威迫基层党组织执行。去年六、七月份，苏州市不少单位以党政工团名义到南京张贴诬蔑省委的大字报，就是由他们策划出来的。他得意洋洋地说，他是对全市各单位党委和核心小组来一次“开卷考试”。由他亲自定题、定路子、定稿，谁个好，谁个孬，由他定分数，“不及格”就挨整。什么党政负责干部，什么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统统不在话下，他可以咒骂这个领导同志是“一条破了肚的鱼”，侮辱那个老干部是“脸长在屁股上”。市总工会成为审讯逼供的刑堂，市人民法院负责人也可被强行打入私牢”。

凡此种种，足见他是依仗一帮一己的势力，骑在广大干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苏州一霸，是一个地道的政治恶霸。

法西斯希特勒的门徒

这个反党恶棍，妄想使人相信他们“闹而优则仕”有理，“结帮代党”合法。然而有几个人会相信他们的鬼话呢？因此他只能乞灵于造谣撒谎，妖言惑众，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组织一批黑秀才，舞文弄墨，抛出大批反动大字报，开动印刷机，大量印制什么“大字报抄编”、“通讯”、“批判材料”。短短几个月，化几十吨的纸张。这些纸片，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成了“走资派”，搞分裂、搞阴谋的反而是“革命派”。再说去年八月的“水佐岗事件”，看看他是怎样制造谣言、混淆黑白的。那时，他炮制的所谓“真相”的大字报在南京贴得满街满墙。什么“省委走资派是幕后策划人”、“省委必须释放被扣人员”、“走资派镇压造反派”等等，一时甚嚣尘上，闹得满城风雨。真相究竟怎样？

“省委走资派是幕后策划人”。制造这个说法，手段卑劣。真相是：他指使两个人，在外宾访问南京期间窜上街头散发传单，妄图制造涉外事件，经值勤民警带进派出所教育后离开。这个反党恶棍一听这个消息，认为是搞乱省委的导火线，就在电话里大声疾呼交代亲信：“要抓住这件事不放！”“这一仗很重要，要打好！”由此可见，策划人恰恰是这个恶棍。

“省委必须释放被扣人员”。说得离奇。原来这个反党恶棍听说两个人离开派出所后，怒气冲冲大喊：“人不要出来，赶快回派出所去。人出来了还有什么搞的呢？！”这就是造成人员被扣假象。从而，他们派人日夜缠着省委闹。

“省委走资派镇压造反派”。是非颠倒了。这个反党恶棍有意扩大事态，布置亲信：“要顶住！不能让步。调子要高再高，舆论要上街，斗争要坚持。不达目的，不要回来。”因此，他的亲信煽动一百多人冲砸派出所，打伤并绑架干警九人，留下十八人强占办公室。事后却反咬一口：省委镇压造反派，公安局抓了苏州市十八个人。

这个反党恶棍造谣惑众，不仅不感到害羞，竟反动透顶地假造语录宣称：“马克思主义承认一切斗争手段”。经他一番编造，似乎造谣是天然合理和无可非议的了。其实，马克思一贯无情地批判那些“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的混蛋。不择任何手段搞造谣、诬蔑、恫吓的，从现代来说，正是那些法西斯。希特勒鼓吹事实可以随意捏造，谣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事实，曾无耻地说：“谎撒得大，就多少总有一些东西得到人们相信。”从那个反党恶棍的行径中，不是使人又一次看到了希特勒造谣哲学的丑恶表演吗？！事情说来并不奇怪。这个恶棍多年来长期研读描绘希特勒发迹史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勃列日涅夫传》、《梅特涅传》等等，悉心研究这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反动信条和各种权术，为他所用，单就造谣一点上来说，他就是法西斯希特勒的门徒。

毛主席在批判右派时说：“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这个反党恶棍就是这路货色，他错误估计了形势，妄想张开血盆大口，吞下人民的天下。猖狂之极，不可一世。但是他的表演，只是“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正当他猖狂得意之际，也是他走到天怨人怒、人心丧尽的绝境之际。人们对他的累累罪行，早已怒不可遏了，一旦“四害”粉碎，他就顷刻破产，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最后终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捣鬼有术 官梦难圆

陶 发

曾邦元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出现了一张题为《谁出的坏主意》的大字报，署名扫马路的女工“奚咏梅”。这张大字报隐晦曲折，内容反动，毒汁四溅，蛊惑人心。当时有些看大字报的人头脑里都有一个大问号：这真的是一个扫马路的女工写的吗？写这张题为《谁出的坏主意》的大字报，究竟是谁出的坏主意呢？人们在琢磨、猜测。

一切搞阴谋诡计的人“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当这张大字报出笼用以欺骗群众时，炮制的家伙躲在阴暗角落里说“谁也不知道这份大字报是谁写的”。真是洋洋得意。但是，过了七天，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终于真相大白。这张反动大字报的炮制者，就是我省那个紧跟“四人帮”干坏事的不大不小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明明是个男人，偏要化装一个“扫马路的女工”；明明他自己出的这个鬼主意，偏偏还要责问别人“谁出的坏主意”。此人巧于伪装，善用权术，不但炮制了这张反动大字报，而且去年南京街头用“余好问”、“赵夫凡”、“范佐之”、“沈维”、“登攀”等化名和“南京工人”、“凤凰山铁矿工人”、“省级机关干部”、“南大职工”等等冒名贴出的稀奇古怪的黑文，其源大都出于这个家伙。有的由他提供材料，有的由他密谋授意，有的由他精心修改，有的由他加添“按语”。总之，“四人帮”吹什么号，这个不大不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就唱什么调。其黑文数量之多，语言之毒，手段之鄙，气焰之狂，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称得上是“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所操纵、指挥的众多帮派山头中最突出的“奇峰”。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扫马路”是个高尚职业、专扫垃圾灰尘，洁化环境卫生。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盗用盛名，其实难副。现在，撕去他蒙在脸上的画皮，一副狡猾奸诈、诡计多端的丑相就显露在人们的面前了，他恰是一堆马路垃圾。

发迹起家靠阴谋

此人曾经打着所谓造反派的旗号，以江苏文化大革命的“代表”自居，在自己头上戴上“老造反”、“造反派大头头”的桂冠。真的是这样吗？

请看他是怎样起家的。

一九六六年初夏，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风雷乍起，此人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他贴过诬蔑红卫兵运动是什么“逆流”的大字报，他密告过学生造反的情况，以便运动后期捞点什么。他不是主动参加造反派组织的，而是当时因为某单位一个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缺乏经验，请他去帮忙想些点子，他就乘机钻进去了。不久，中央公布了《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并在北京开了大会，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他觉得“苗头”看准了，于是就学白衣秀士王伦的手法，把这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一个一个地搞下去，夺得了主要领导权。

此人一进入这个群众组织的领导层，从不愿甘居人下，一定要爬在万人之上。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指鹿为马，落井下石，搞阴谋，放暗箭，文过饰非，玩弄权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过错推给别人，耍尽了两面派的手法。为了窃取一派组织的第一把交椅，

他或是大造舆论，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只有他才是理所当然的“头头”；或是乘人不在，召开会议，搞“政变”，一脚踏开他的对手；或是秘密私整材料，搞突然袭击，一闷棍把人家打下去。一九六七年初，这个单位一个群众组织开骨干会议，曾把他开除出勤务组。可是，这个惯于玩弄阴谋诡计的人，又钻到南京地区一个群众组织里面并当上了“造反派的大头头”，把他自己打扮成为“造反派”的主要头面人物。

看家本领是“摸门”

当此人向“四人帮”告状的黑手被人民抓住时，无可奈何地说：“我摸错了门”。

这话不由得使人想起，此人不是标榜自己“大方向一贯正确”吗？原来都是假话。此人一贯说谎，唯独这次说对了一部分，就是在他的脑袋中，从来没有什么是“革命的原则”，什么“革命的道德”。什么“要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等，这些无非都是他放在嘴里唱的漂亮口号，而他实际所遵循的信条是“摸门投机”。这个自供状，撕去上他掩在脸上的遮羞布。事实真相是：他早就摸进了林彪、“四人帮”的黑门，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有个时候，他觉得“保”某些人对自己篡权高升有利，这个门一定要摸，这个机非投不可，于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可是，当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抛出某一反动口号以后，这个家伙一看风向不对，又立即扯起“反”旗。当这一口号遭到毛主席痛斥以后，他摇身一变，又变成一个“保”派，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赌棍！一个货真价实的变色龙！去年夏季乌云压城，这个人在写给“四人帮”的黑信中，又掉转枪口攻击他过去“保”过的某某人，这是为什么？原来，政治流氓王洪文曾带信说此人同某某人“撕不开脸皮”，“江苏的权不能给知识分子掌”。原来，他摸到“四人帮”的意图，为投主子所好，以达掌权私欲。可见，他的“保”和“反”都是摸门投机。

他自吹是热爱周总理的。真是这样吗？一九六七年初，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解决江苏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就对周总理大为不满。他背着周总理，串通王、关、戚和“四人帮”，深夜秘密转移驻地，使周总理的秘书找不到他。周总理逝世消息传来当天晚上，他在家和几个人打扑克取乐，直到深夜。去年三月，当南京广大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时，他却在帮派黑会上，恶毒攻击说这“是代表右的势力抬头”，扬言“我们要还击”，并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份以“凤凰山铁矿工人”署名的“大字报”，打着悼念周总理的旗号，恶毒攻击周总理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紧跟“四人帮”，把悼念周总理说成是“反动思潮”，又用歌颂周总理的手法来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充分暴露了他丑恶的政治投机商的嘴脸。

他自吹是拥护华主席的。真是这样吗？去年八月，他就攻击华国锋同志一次重要讲话，胡说“他的讲话我看有问题，不提走资派的问题”，说什么“那些老家伙鼓掌了几次，走资派那么高兴，他的讲话撑了谁的腰不是很清楚吗？”。更可恶的，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以“登攀”的化名炮制了“两帮论”的反动大字报，说什么当前“斗争任务有两条”，斗争有“两种对象”，党内有“反动的两帮”等等，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领袖华主席，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梦想有朝一日“四人帮”重新上台，他又可请功领赏，攀登高位了。

他自吹是反对“四人帮”的。真是这样吗？此人与“四人帮”早就挂上了钩。他自己多次得意洋洋地对人说：“张春桥对我是了解的”。他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也有勾结。

去年五月，他对一个人说：“这次运动一开始，我就注意向上海反映情况”。此人不但多次向“四人帮”派来的所谓“记者”告黑状、送黑材料，煽动南京和其他一些市县的帮派山头向“记者”告黑状、送黑材料，他还多次参与策划省里一群众团体的一个负责人向“四人帮”告黑状。他也亲自动手向“四人帮”写信告状。他在黑信中恶毒攻击省委负责同志，是股什么“势力”；竭力吹捧美化“四人帮”，恳求他们“关心江苏”；再三表白他自己对“四人帮”的一片忠心，下决心要紧跟、紧跟。看，他就是这样“反对”“四人帮”的！现在，这个人诡辩什么他给“四人帮”写信只是“摸错了门”。这里，一贯不老实的人倒是无意中说了句老实话，不打自招地供认他一贯就是干的“摸门投机”的买卖！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出现这种人物在历史场景中是屡见不鲜的。马克思曾经无情地鞭挞过这类丑物是“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这些话给这个不大不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勾勒的肖像不是很酷似吗？！

官迷心窍露野心

投机为了做官，野心来自权欲。这个一贯搞阴谋诡计的家伙，早就是一个权欲熏心的野心家。他靠政治投机、弄玩权术当上了造反派头头以后，私字恶性膨胀，官瘾越来越大。

一九六八年春天，他刚刚当上了某单位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常委，就情不自禁地对人讲：“我现在地位不同了，要当省委常委，可能提拔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短短两句话，充分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一九六九年选举九大代表时，他还只是个预备党员，居然妄想当代表。当他知道酝酿代表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大名，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立即指使几个人出面，向党中央写信，要求能让他参加九大。他的野心理所当然没法实现。代表没有捞到，耿耿怀恨在心。他在黑日记中写道：“我省九大代表于昨日出发，今天晚上（党）小组正式讨论我的转党问题，问题的安排可以看出某些人的指导思想，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关系，值得注意领导权的问题就是领导班子的问题。”这完全是大野心家林彪的腔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一九七四年选举四届人大代表时，他又东奔西走，一心想当代表。结果，野心家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他并不甘心罢休，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官”、“权”二字。他从反革命立场总结教训认识到，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党的干部政策的省委负责同志，是他向上爬、当大官的巨大障碍。他利令智昏了，就对省委负责同志怀着刻骨仇恨，时刻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四人帮”另搞一套，层层揪走资派，到处抓代理人，他以为实现政治野心的大好时机到了，于是赤膊上阵，大打出手，和“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勾结串通，呼应配合，妄图搞乱江苏，搞垮省委，乱中夺权，以实现他当大官的梦想。

为了这个目的，他搬出“四人帮”的“帽子工厂”、“钢铁工厂”的所有货色，一古脑儿向省委负责同志抛去，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事件的策划人”等等，真是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他几乎把字典里所有恶毒肮脏的词句都翻出来，满街满巷地向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撒去，什么“还乡团”、“复辟狂”、“刽子手”、“政治上的流氓”、“卖国投降”等等，真是泼妇骂街，可笑可恨。他自己这个帮派还开设了“谣言工厂”，一会儿说，这里“起火”了，那里出了个“事件”了，一会儿说这个“宣战”了，那个人又“亮相”了。他的“谣言工厂”的产品和他主子“四人帮”工厂的产品比较，有的还有所创造发明，什么“三

代走资派”、“当权的反革命”、“党内资产阶级中反动的两帮”等等，真是花样百出，无奇不有。这一切，都道出了一个险恶的用心，就是他要把省委负责同志置于死地，取而代之。

如果说，这个人的野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还多少有一点遮掩的话，那他在去年就显得更加赤裸裸了。他叫嚷“造反派就是要掌权”，“你们不要怕人家说是官迷，造反派就是要做官”，“我看我们造反派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出要当官”！他提出“江苏必须有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进省委常委”。连他的家属也对一个人讲：“我家老×当了省委书记，你也可以当个宣传部长”。甚至他和帮派同伙排名单，议论起“江苏谁当第一把手”的问题来，真有点江苏大地“舍我其谁”的架势了。

其实，此人也实在太缺乏自知之明。当他要大官、要大权的野心不能实现时，在黑日记里大发怨言说：“人们对我的认识，我对自己的认识，都应当在符合实际情况的前提下统一起来。”这个话，似乎他得不到加封晋级，飞黄腾达，是由于人们对他的认识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人们对他的认识和他对自己的认识怎么统一起来呢？又怎么会在实际情况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呢？

他对自己的认识：“老造反”，“一贯正确”，“受过错误路线的迫害”。人们对他的认识：“老投机，两面派，极右路线执行者的帮凶和告密者。”

他对自己的认识：“文化革命的功臣”，“江苏造反派的领袖”，“新生力量的代表”。人们对他的认识：混进造反派的典型资产阶级政客，思想腐朽、道德败坏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这两种认识怎么能“统一起来”呢？这两种认识究竟那一种“符合实际情况”呢？《红楼梦》里甄士隐对《好了歌》作的注解有两句话：“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移赠此人，不是就在“实际情况”下把认识“统一起来”了吗？这结局，对他说来，真是“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

乱党篡权搞结帮

此人官瘾如此之大，又妄图一步登天。终南无捷径，他只能求助于一切机会主义所惯于施展的伎俩，搞结帮拉派，纠集一伙人“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骂党、乱党，最后搞垮省委，打倒省委负责同志，攫取权力，终成大业为最终目的。他们人数很少，神通却相当大。去年春夏秋之际，南京地区有一伙人兴妖作怪，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其源之一就出于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帮派捣乱。

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深知要在江苏结帮乱党篡权，如果没有“四人帮”这样的后台靠山，是难成“大业”的。因此，他出卖灵魂，打小报告，递黑状，投奔王、张、江、姚这个黑帮“门庭”。他深知搞帮派活动的“行情”，自己手中没人没枪还是“吃不开”的，所以他必须在省内结成“帮势”，压住台脚。

他的野心和“四人帮”在我省那个代理人的野心，心心相印，一拍即合。省里那个代理人有两个追随“四人帮”大搞“三搞一篡”的人很需要他这样的张铁生、翁森鹤式的人物在明里冲杀，他也很需要卖身求荣的代理人和追随者在省委内部暗中支持；他搞非法斗争在外，那三个人搞合法斗争在内，内外勾结，紧密配合，狼狈为奸。他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为了打倒省委负责同志，取而代之，他们演了一出丑剧。你看，他吹捧省里那个代理人对运动“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态度明朗”；赞扬那个搞过“三破坏”的人“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说他是帮派小山头的什么“撑天柱”；奉承另一个追随者“头脑灵

活，敢于斗争”。一句话，这个家伙要靠这些人“领导”而“登龙”。所以，他经常去登门领旨。那三个人也面授机宜，对他路线交底。那个代理人对他示意：省委路线不端正，就不能解决你的工作问题。代理人一点题，这个家伙就立即展纸挥笔，大做端正省委路线的文章。代理人说外宾来不贴大字报没有这个规定，他就恶毒攻击省委负责同志“卖国投降”，“背叛国际主义”。他亲自起草签署真名，抛出《七人声明》，事先也送给代理人一份。他们就是这样互相串通、狼狈为奸的。这个不大不小的野心家、阴谋家，由于得到“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等的支持，捣鬼作乱，大干大闹，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他这个帮派和省里其它地方的帮派，宗旨相同，息息相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凡是积极搞省委负责同志的，“都是好的，都要支持”，“都要团结”。这样，为了乱党篡权的共同目的，他就和其他地方的帮派头目结在一起，团到一块去了。他把手伸到徐州，勾结那里的帮派头目，妄图控制江苏北大门；他插手到沪宁沿线、镇宁山区，派人去传达黑话，叫人来面授机宜，联络各路头目。真是费尽一番心机。单说，他同“四人帮”在苏州那个代理人的勾结：两年前，为了抢权，两帮之间曾经闹了一场饱狗和饿狗的有趣斗争，他骂那人“×老虎”，“要揭他的老底”；那人骂他“腐儒”，“要埋之于秦淮河之滨”。真是有他无我，势不两立。两年后，他日益明显地看到苏州市帮派头目是“四人帮”及其上海党羽的宠信人物，便一反常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主动上门，积极靠拢，肉麻吹捧不多时前还咒骂的什么“老虎”是“坚定地站在革命路线上的领导干部”啊，要向他“学习”啊等等。终于和苏州市的那个代理人消除了“历史的误会”，握手言欢，达成了某种默契，竟大讲起“团结并肩战斗”来了。苏州帮派在南京蓄意制造了水佐岗事件，他亲自登门慰问，表示敬意，写大字报支持。苏州帮派要揪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他帮他们刺探地点，通风报信。去年九月，他派人同苏州的帮派共同密谋全省各山头如何统一行动，搞垮省委，篡党夺权。他要苏州方面“多支持”他，苏州的帮派则要他对全省的帮派团结问题“多做工作”，以便推行“四人帮”在全国的篡党夺权阴谋，十月份在南京搞一个“大动作”，夺取省委领导大权。

但是，混迹于帮派生涯的此人，更知道，同苏州帮派的“神圣同盟”是个暂时的联盟，要成大业，或者“按资分肥”，还得培植和扩张自己的“嫡系帮势”。于是他在“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和追随者的支持和指使下，打起“造反派要团结起来”的旗号，千方百计把南京的各种标记的山头、派别，纠集到“登攀”旗号下，网罗一批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自己当上了草头王。物以类聚，那个在南京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贪污盗窃、流氓成性、奸污妇女的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还有臭不可闻的“屠宋”，也成了他家门庭的常客。他对帮友说“屠宋”是个“用得着的人物”。这些人都成了他的亲密“盟友”。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共产党的天下是毛主席领导广大革命群众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而取得的。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结帮拉派纠集了一伙丑类，竟想联络四方闹南京，乱党篡权霸江苏，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鲁迅早就指出：“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我省那个紧跟“四人帮”的不大不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就是这样。虽然捣鬼有术，但是官梦难圆。“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个人本想进省委书记办公室，现在却陷进了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了全省人民的众矢之的，这真是历史的嘲弄啊！